

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

The Oral History and History Writing: Past, Present and Now

文 黎煜 /Text/Li Yu

提要：本文立足于将口述视为对话史料，考察其对话本性对历史撰写的意义。“对话”赋予口述与生俱来的微观撰史特征。“对话”为使用口述史料的宏观撰史者提供“现在”与“过去”、“当下”三种声音的交流。“对话”让口述中的“伪”、“误”、“虚”、“隐”等“不真实”信息对历史撰写有了丰富的意义。

关键词：口述历史 史料 历史撰写 对话 过去 当下 现在 真实 伪 误 虚 隐

英语中 Oral History 是一个单意的所指，含义为口说的历史。然而在汉语中，“口述历史”有两种读解方式：若将之看作动宾结构，则“口述”意为“口语言说”，“口述历史”之意为“口语言说历史”，更深一层，即用口头言说的方式撰史；若将之视为偏正结构，则“口述”意为“口说的、口语表达的”，其内涵与英文 Oral History 一般无二，意“口头的历史”，更深一层，即为口语述说的历史事件。“口述历史”在汉语语法中的丰富读解与西方史学界对“历史”一词的双重定义不谋而合——“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¹⁾

口述作为史料、方法、史观、人文关怀，对历史的意义是多重的。最终，它们都会体现在历史撰写的方方面面。口述最卓越的贡献是人民性特征，它改变了历史撰写的重心，将数千年的帝王将相史变成了人民的历史。这无需笔者多言。本文作为《对话过去、当下、未来：口述与历史》的姊妹篇，所考察的，仅仅是口述作为一种对话史料对历史撰写的贡献。笔者将史料分为独白的史料与对话的史料两种，口述是对话史料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过去、当下、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对话场域’。它可以被如此定义：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史料”。⁽²⁾

对话属性，使得口述从对话展开的一刻就具备微观撰史的内在品质。由于口述记录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声音，还有采访者“当下”声音的介入，它对于宏观撰史的“现在”时态，提供两种维度的声音，协助撰写者从“现在”——“过去”的对话书写方式转而进入“现在”——“过去”——“当下”的对话状态。在口述对话碰撞所呈现出来的“伪”、“误”、“虚”、“隐”等“不真实”信息对于历史撰写，既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资源。它们谱写了一曲由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组成的多声部乐谱，激发撰史者创生的幻想。

口述与微观撰史

如前所述，在汉语语言学中，口述历史具有两种涵义：用口头言说的方式撰写历史；口语述说的历史

事件。在现实采访中，口述莫不如此。它既是以记忆为“主线”的史料，又掺杂着访谈双方口头治史的表述，集史料与微观撰史为一身。

口述采访中的微观撰史部分由采访人与受访人共同完成。一个口述项目从立项开始，到流程的制定，圈定采访对象，拟写采访提纲，现场对话，一直到誊写采访抄本，整理出版稿件，无一不体现出采访人为调出记忆所做的努力。就像诠释学所理解的：“口述历史是以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的访谈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但口述历史的访谈者并不是在‘无’的状态下启动口述历史的研究程序。访问者是在对其所研究的历史课题具有某种背景知识或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开始口述访谈的，也就是说，在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访问者与历史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先在’的诠释关系。”⁽³⁾

采访人将自己变为治史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唐德刚先生，他将口述当做撰写历史。他认为口述不仅是一种历史撰写，且比一般的历史著述难度更高，“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⁴⁾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一概是以陈述体回忆录的形式写成，抹去对话的痕迹，将不实之处一一校正、删除，《胡适口述自传》汉语版署名为“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李宗仁回忆录》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署名则为“唐德刚撰写”。书中只保留 15% 李宗仁口述的原始资料，自己添加 85% 的考据。唐德刚谈及李宗仁口述：“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都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⁵⁾这样做的结果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研究”（批准号 09BC031）阶段性成果。为避免重复，本文将口述历史简称为口述。

[1] [英] 约翰·托什 (John Tosh)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xviii 页。

[2]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未来：口述与历史》，《当代电影》2012 年第 1 期，第 99 页。

[3] 陈献光《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 年第 7 期，第 81 页。

[4] 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0 页。

[5]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22 页。

精确度上尽善尽美，但是却湮没了李宗仁的性格。他感叹：“把一个一级上将，训练为博士班研究生。”⁽⁶⁾ 这种努力让人肃然起敬，结果却改变了李宗仁的身份与口述的原始面貌，是采访人的越权行为。陈墨批驳唐德刚的做法是“把口述历史的受访人当做了历史信息工具，而在有意无意中压制了受访人的主体性”。⁽⁷⁾

口述采访人必须抱有撰史的预期目标开展访谈，但并不是说采访人要将访谈本身变为著述，把自己从一个采访人变为撰史者。采访人必须恪守越权的欲望，尊重口述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主体性、多义性，将口述作为一手资料贡献给未来的撰史者，而不是一本经过加工的二手史书。即便采访人有志于撰史，所撰的历史应该与访谈是两个不同的文本。

一个规范的口述文本，应该包含采访人与受访人的两种声音，也应该全面涵盖口述中的不真实（以注解的形式标识出来即可）、方言、口语特点等信息。只有这样，真实鲜活的记忆才有可能在口述中获得生命，也才能够为撰史者提供原始的信息。

受访人在讲述自己故事时，也同有控制不住的撰史冲动。他们往往把阅读到的历史资料、辗转听及的掌故、多年来人际交往的结果等等与自己的经历混合，以第三人称语气与局外人的身份对历史大加评述。这些话语构成了微观的口语撰史。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程骥提到，他们在进行基层社会史调查时，被村镇居民推选出来的文化精英所讲的完整生动的故事中，限于叙事，而且有对人和事的评价，“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历史研究者的‘方法’：分析所叙事件的因果并进行解释和评价”。⁽⁸⁾

在我们从事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刘静贞听到丈夫王德成讲述在“满映”当摄影助理时，日本摄影师美化拍摄开拓民在“满洲”的生活，联系自己作为一个在华生活五十余载的日本人听到、看到的故事，对开拓民被骗来华的历史、光复后的惨境、被日本抛弃的命运、开拓民遗孤被中国人领养的故事、中日建交后遗孤回到日本的尴尬处境，用口语的形式，娓娓道来，掺杂评述，简直就是关于日本开拓民的一篇口头历史典籍，并带有明显的日籍中共党员的作者身份印记。

受访人口头撰史的部分，对时局的评价等等，因太过主观，缺乏史学训练，“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与“后见之明”混杂等等原因，将销声匿迹在规范的出版物中。可是，它们在实际访谈中却十分活跃，不仅与其谈论的自生经历密不可分（撰史与述史在访谈中相互穿插，简直就像扑克牌的两面），且直接决定着记忆生成的方式。

卡尔认为：“撰史者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⁹⁾ 对于使用口述史料的撰史者而言，在研究受访人的口述材料之前，还要研究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历史观。也就是说，未来的撰史者必须对

口述中出现的微观撰史保持密切关注，了解它们，才算揭开口述历史秘密的封印。

口述与宏观撰史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原始资料代表过去的声音，研究者代表现在的声音。撰史的过程就是以撰史者为代表的“现在”与以史料为代表的“过去”之间的对话。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¹⁰⁾ 对于撰史者而言，使用口述史料可以进行“现在”与“过去—当下”的多重对话，让“现在”与“过去”，“现在”与采访“当下”，“现在”与“未来”发生复杂而多向的联动。

弗里德伦德尔指出，在记忆与研究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区域，“我们必须把一种尚属新近的、很有意义的过去的代表想象为连续体：它的一端是集体记忆的构造物，另一端则是冷峻的历史研究，可是我们越是接近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区域，以便获得对一个群体的历史的前后关联的解释，那么它的两端就越是会融会贯通起来”。⁽¹¹⁾ 口述历史中“当下”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中间区域。撰史与历史事件好比空间场域中两个孤悬的站点，史料是打通两点之间联系的绳索。口述采访者提供“当下”的声音，就好比在“现在”与“过去”的两点之间，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桥台，让其联系更加坚实、紧密。

口述以“当下”的独特方式连通了撰史者与过去事件，因此，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的历史撰写，它都会做出独特贡献。

西方传统的历史编撰有三种方式：描述、叙事和分析。描述类的历史著述类似文学作品，着重对历史场景的逼真再现，对历史人物的鲜活刻画。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文学家的想象力，灵感来源是大量生动的细节。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属性即是细节性。⁽¹²⁾ 它因此被指责为“过多的细节毫无裨益，只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¹³⁾ 反面的声音，正好说明口述史料细节的

(6) 同(4)，第11页。

(7) 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年第3期，第103页。

(8) 程骥《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第125页。

(9) [英]卡尔(E. H. Carr)《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3页。

(10) 同(9)，第115页。

(11) Saul Friedlander, *Memory, History,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1993, p. VII. 转引自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论将回忆之声重新纳入历史叙述》，载[德]哈拉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2) 参见李镇《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当代电影》2011年第9期，第99页。

(13) Barbara Tuchman, *Distinguishing the Significant from the Insignificant*,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Alta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 p. 94-98. 转引自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力量。口述不仅为突发的大事件补充了更多的侧面与角度，而且让一些常态化的生活细节浮出水面。比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常规问题有学校教育、家庭背景、婚姻、子女情况、职称评定、观影感受、家庭收支等等。总之，口述能为描述类历史撰写提供详尽的细节与鲜活可触的人物。

叙事类历史编撰致力于对于过去事件进行有因果关系的阐述，是19世纪兰克学派最常用的编撰模式。它建立在词源学 history 中 story 的基础上，即对故事性的关注。叙事类著作擅长于通过描述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宏观视角来构建一个阅读愉悦的文本。为了做到叙事完美、逻辑清晰，著者易对历史事件做简单线性处理。这类撰史被越来越多地指责为将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强暴地编排为“以先后为因果”。⁽¹⁴⁾ 口述内部具备微观撰史特征，其史观独立于撰史者的结论，且较为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口述既是一手资料，又是被采访人“当下的声音”诠释过的一手资料。使用口述与其他资料进行互证，可以丰富撰史者的因果逻辑，并部分消解其“以先后为因果”的做法。同时，口述常常以一个项目的形式展开，具备进行大面积民众调查的特征，听取“众声喧哗”，可能会对撰史提供更加丰富、更多元的、民众的思考，协助其避免根据一两项线索进行解释的简单方法。

分析史学的兴盛比叙事晚了近百年。年鉴派对总体史的关注，极大推动了分析史学的方法技巧。分析更注重于阐明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及其对正反双方意见的评估。随着历史研究分类细化，以问题导向为长的分析史学越来越盛行。然而，分析史学也并非白玉无瑕，它被认为“得之于思想的明晰性，失之于历史的直观性”，“有一种无法避免的静态特性……好像时间机器被停止，以允许对机房进行更彻底检查一样”。⁽¹⁵⁾ 针对分析史学直观性、生动性、叙事性略逊，口述或多或少可以做一些弥补。唐纳德提到，口述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解释，“其他的史料通常都能提供历史上的‘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但是口述历史访谈却能在‘为何’(why)和‘如何’(How)上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和内涵”。⁽¹⁶⁾ 口述对事件的阐释建立在个体生命感悟，它将为分析编撰方式注入生命的原动力与记忆的活力。

西方最初的描述类著述，有着大量口头传述的影子。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故事来源于乐师口头背诵的古代传说。苏格拉底、耶稣的言论也是在口头传述的基础上记录下来。叙事类史学偏重文献资料忽略口头传述。20世纪，分析史学将口述作为科学研究的手段再度开始采用。口述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轫的最初目标，即是“社会科学的处理”，历史撰写对于口头资料的运用呈现出与古代相呼应的势态。尤其60年代以来的西方理论转向，助推了口述的蓬勃发展。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底层的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带动“由下而上看历史”、“草

根文化”的史学新转向。黑人、女性、儿童、同性恋、移民、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开始发声，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对应的“他者”跃跃欲试登上历史舞台。口述正好应和了这一潮流，成为史料学中的新宠。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6—1972年间“桃瑞丝·杜克美国印第安人口述历史项目”，搜集有关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四千多份。诸如此类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妇女政权论者口述历史计划”，1967年由福特基金会主办和资助的有关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纪录计划”。⁽¹⁷⁾

中国的历史编撰形式与西方不大相同。长期以来，文史不分家。唐德刚的16字真言足以说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¹⁸⁾ 因为注重文学性的缘故，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编撰方法，对口头传述的使用也与西方大不一样。

中国历史编撰体例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通史、断代史等。源自《春秋》与《左传》简单记事发展而来的编年体在《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中得以定型。编年体从《春秋》开始，就不断地从民间吸取口头传述。唐尧虞舜的历史都是传闻，“三皇”、“五帝”也是从口头故事中记载下来的历史。

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其代表作《史记》文学造诣之高，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20岁之际离开长安前往全国各地，前后十几年，采撷民间口头传述，了解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五帝本纪》主要是依据神话和历史传说写成。在选择过程中，他将黄帝有四张面孔、活了三百年，乘龙升天等故事，以“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为由，没有实录到《史记》中。唐德刚大胆假设，《史记》列传70篇，有一半是司马迁根据口头传述整理编辑而成。⁽¹⁹⁾

典制体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其代表作《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门下有子目，子目之下又有细目。中国最初的撰史采用大量口头传述，但发展到典制体以后，官史、书面文献逐渐排挤民间的、口头的史料。这与西方的道路几乎相同。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撰写的方法从单一走向了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比如利用修辞学(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诠释学、语言学的方式撰写历史。在中国，口述对历史撰写开始发挥作用却是近年来的事。撰史者渐渐意识到，

(14)(15)同(1)，第131—133页。

(16) [美]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7) 有关美国口述历史项目的资料，参照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第72页。

(18)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9)同(18)，第220页。

虽然 20 世纪的史料空前丰富,但大多集中在国家大事、精英人物,记载普通人生活常态的史料较为单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曾经怀着撰写人民史的宏伟目标来写全新的历史。由于全盘借鉴马克思主义治史方式,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投入较多关注,但对其余史料及史书的挖掘出版、搜集整理相对薄弱;左翼文化流派的史料保存丰腴,其余流派的材料保存则嫌不足;左翼人士的回忆录、采访文章如火朝天,其余人士则甘于沉默。

以电影界为例,就存在着明显史料保存与历史著述冷热不均的情况。比如,明星公司聚集夏衍、蔡楚生等大量左翼人士,建国后,他们大多居电影领导岗位,十分关注搜集、保存、捐赠相关资料与图书编撰。因此,明星公司的资料(胶片与文图)显然比亲国民党的“联华”更丰,“联华”则比远走香港及南洋的“天一”有幸。国民党官办机构“中制”、“中电”的资料在大陆也不完备。该机构电影人藏于民间,于沉默中匿迹。甚至发生过何非光(执导抗战电影数量最多的导演)在生之日就被海峡两岸报道死讯的误会。⁽²⁰⁾至于日伪电影机构“满映”、“华影”,与日伪关系不明的电影人张石川、张善琨的相关资料与历史著述就更加疏落。

老电影人、老电影机构在 1949 年前后分流到内地、台湾、香港各一部分,电影史料随之形成三地分离的局面,电影著述亦各说各话。即使将内地、台湾、香港的电影史料全部堆积到一处,也难以形成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档案库。原因不言自明,甲阵营的甲老在甲地需与甲政权保持意识形态一致性,若是甲老迁至乙地,或者乙老生活在甲地,他们的资料将被甲乙丙三地的史书或多或少忽略。甲老关于乙阵营人士与机构的回忆,乙老关于甲阵营人士与机构的回忆,都将随之葬于坟墓。

口述历史有志于以对话为经纬,缝补业已穿孔的史学“织物”上的漏洞。在未来的中国史写作中,口述将作为补缺的史料,将对历史著述格局的重新铺设意义非同小可。

“伪”、“误”、“虚”、“隐”与历史撰写

尽管口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贡献卓越,仍然无法逃脱史学家们的指责。他们认为口述历史无法避免先天缺陷,比如人为介入的主观影响;援引后见之明导致陈述失真。这使得我们无法规避萦绕已久的关于真实性的争议。历史的真实性就像蜃楼中无法抵达的彼岸,从来就没人确信能够提供标准答案。基于此,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必须落到一个可以相对横向考察的坐标系中,即与其他文献资料的对比。保罗·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中揭示了西方传统史料的迷惑性与危险性。中国同样如此,自古以来伪书多如牛毛,仅张心澂《伪书通考》所考辨的古书就多达 1104 部。⁽²¹⁾

由于口述对话现场对质的特性,具有历史背景知识的采访人同时充当了检验员。“对象(被访问者)的当

下存在性使口述史家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口述史家可以对某些史料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质疑。”⁽²²⁾从这点上看,口述在对真实性的把关上至少不比其他文献资料弱。笔者在准备口述采访的阅读中,看到 X 君在《中国电影报》、中央电视台采访中以移花接木、真伪杂糅等手段进行高明扯谎。历史的另一位见证者 L 君激愤不平,在自己花钱出版的著述中驳斥 X 君的叙述。现实的国情是,谁有机会发言,谁就可以凭他的意愿讲述历史。

与以上出版物不同,口述历史先天拥有一个过滤器——采访人。他既是对话者,也是历史事件真伪的第一个甄别者。汤普逊认为在真实性这点上,口述历史比文献资料而言,“可以予以自信得多的回答”,原因就是历史学家的参与。⁽²³⁾这也是笔者不同意将某些史家将其他文献拜为“治史之瑰宝”,而将口述贬为“荒腔走板”⁽²⁴⁾的原因。

不真实的史料我们不能统称为虚假。真实的外衣只有一件,不真实的外套花样翻新。在口述中,最常见的莫过于“伪”、“误”、“虚”、“隐”四种。

1. “伪”——指受访人出于主观原因,故意篡改与伪造历史事件,进行道德上的有意欺骗。

常常有外行好奇者问:“受访人会不会肆意撒谎?”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不敢。”陈墨在采访近百位受访人,七百多个小时录像后,确定说:“在我的实际采访经验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采访对象对着摄像机、录音笔进行有意的欺骗(这属于道德范畴),而最多不过是程度不同的言不由衷或与真实不符(这属于心理范畴)。”⁽²⁵⁾

口述对话很难说完全杜绝道德欺骗,但确实确实减少了“伪”的发生,它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口述采访人一般都是在本专业有着长期史学熏陶的学者,具备专业的历史知识与辨伪能力。在筹备采访提纲前,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甚至还包括受访人的官方档案以及大量的书信稿件等。

其次,口述一旦立项,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采访行为,而是一系列网状访谈。比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将 200 位受访人进行行业与单位分片,以采访人认领的形式实行“包产到户”,每个采访人按自己

(20) 关于何非光死讯被海峡两岸提前发布,见黎煜《断臂之谜:阮玲玉残片(再会吧,上海)》,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 年第 6 卷第 9 期,第 43 页。

(21) 陈漱渝《口述史料中的误·伪·隐》,《团结报》2009 年 12 月 10 日,第 5 版《文化纵横》。

(22) 同(3),第 80 页。

(23) [英]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6 页。

(24) 胡志伟《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近代名人亲撰的日记、函电、公文都是治史之瑰宝,它们比几十年后所录的口述历史要可靠得多,许多荒腔走板的口述史往往在第一手文献面前穿帮。”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务实——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 页。

(25) 陈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当代电影》2010 年第 3 期,第 57 页。

的研究方向集中对某个电影领域或单位采访。陈墨主攻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出版社；吴迪有意于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皇甫宜川心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张震钦与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渊源甚深；张锦专注于长春电影制片厂；李镇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影厂情有独钟；边静瞄准中影公司与电影局；周夏着重女性电影导演；苗禾心仪电影音乐人；李相偏爱于港粤电影。

记者的采访重点主要是新闻纪录电影人，大多集中在中央“新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影”等几个单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十多岁起就在延安认识，晚一些的也是二十多岁就开始共事，交际将近七十年，一起工作、比邻而居，形成一张密切的关系网。每个人都可以对另一个人滔滔不绝谈论良久。采访人会不时引用受访人同事的话语或者观点。这让受访人明白，谈话双方处于四通八达的访谈链之中（除非特别需要保密的事件）。

这样，当我们拿着一份长达万言，涵括其生涯的采访提纲，递给受访人时，当我们在谈话中表现出某些史实我们不仅了解而且在某些方面掌握更多“内幕”时，他自然知道，来者是一个经过学术修炼，有着史学经验，且触角四通八达的明白人。他不敢亦不会在采访人面前实施道德欺骗。

再次，即便受访人在访谈中做了“伪”，采访人在现场或者整理出版文稿时会进行更正，也会在其他的采访中被交互式检验发现。由于单个的采访是项目组采访链中的一环，采访人会将此次访谈的部分内容（除去需要保密的部分）传输到其他谈话场域中，未来的受访人将担任此次谈话的监督者。同样，该次谈话者也是之前受访人的监督人。在一系列的访谈链中，采访人/采访组担任了让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受访人进行交互式检验的媒介。

因此，采访者以在场者的身份，构建讲述真实事件的道德气场。采访人有备而来的阵势及存在一个访谈链上的交互式检验，这些都多少遏制源于道德欺骗的“伪”。

2. “误”——受访人由于记忆、知识缺陷等原因造成的信息失真现象。

“对话”的检验功能保证口述与历史事件之不会发生因“伪”导致的离谱走样。然而由于心理原因导致的言不由衷，或者由记忆原因导致的信息失真却不可避免。我们怎样看待口述中的“误”？

“误”不可避免，但在口述中，“误”将在三个阶段被“标识”：

(1) 采访人会在对话中，以插话形式对“误”表示怀疑——“我怎么听别人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吗？但有人说，那时您并不在场啊？”这会引发更多的挑战性回答。比如C君几十年笃信，自己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新中国成立

的纪录影像。可是，该片的职员表上没有其名，部分当事人不记得曾经在拍摄现场看到他。记者在采访中问：“1949年10月1日那天，您在哪里？在做什么？”他语气笃定，对记者的无知（其实是有备而来的“无知”）有些惊诧：“在哪儿？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他讲述完细节后，记者追问：“怎么《新中国的诞生》职员表上没有您的名字？G君与Q夫人也说您不在场啊？”这样的问话自然引出他更多激情昂扬的补充性回答。早期纪录片职员表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客观事实，当事人所剩无几，回忆也不见得可靠。如果根据上述两个参考信息，来确定C君没有在该日拍摄开国盛况，那是一种草率的做法，但我们也不能够凭借C君的描述就确凿这一事实成立。口述的目标并非判断正误，而是将怀疑搬上桌面，丰富历史的声音，给予撰史者多元的选择。

陈墨提到在对话中“插入存疑标志”，可将怀疑明朗化。其方法有：“一是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二是适当举出反证；三是适当提高自己的音量；四是——在上述三者都无效时——沉默15秒或20秒，故意间隔。这些‘反常’的举动，如同人为的标签，以期能引起使用录像、录音资料者的注意。”⁽²⁶⁾

(2) 即便采访人在现场没有立即采取辨“误”措施，日后在整理出版访谈文本时，文稿选编者（一般情况下由采访人担任）会对访谈细节进行谨慎周密的勘误补遗。一些无法考证真伪的史实，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通行的方式为——以注解的形式标明“此处存疑”，并附上考证过程。

(3) 访谈者会选择高水准的专业编辑，协助此项工作尽善尽美。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过滤，口述出版文本的失误将大大减少。

3. “隐”——受访人囿于各种原因，隐去一些不愿为人知的事情。

“隐”的传统由来已久，并非口述独有。周作人将自己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删去了大约十个字，其内容涉及与长兄鲁迅失和。口述历史中的“隐”包括直隐与婉隐。直隐——直接告诉你，我要隐去一段陈述。“还是不说了”，“记不清了”，“关机后告诉你”都是直隐的谢绝词，就如同文字资料中“此处删去多少字”的做法。婉隐——把自己包裹在人云亦云的话语中，隐去自己真实的心灵。启之谈到：“（有些）叙述不过是党的文件和历史教科书的补充。在这类口述中，口述者的心灵包裹在一团迷雾之中。”⁽²⁷⁾

在现实采访中，直隐与婉隐往往掺杂在一起。Y女士，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同时又是成功的电影事业家，历经风雨，见证伟业，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²⁶⁾ 同(7)，第101页。

⁽²⁷⁾ 启之《口述历史研究：受访者的心理》，《电影文学》2010年第21期，第153页。

囿于被各种新闻媒介与政治思想“塑造”得太厉害，采访始终没有超越已经出版的文献内容，谈话只是对现有史料的重复。她的“婉隐”让采访人很沮丧。突然，回答一个知名人士在“文革”中如何处理某事时，Y女士一改路数，连续说了三遍：“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嘛……”略做沉思后，她说：“把摄像机关掉，我告诉你。”关掉机器后，她对采访人讲了足足半个小时。在后面的采访中，她也常常使用这招，一旦谈话要越过她所圈定的禁忌线，就会命令关机——“直隐”。虽然撰史者不知道她对采访人都说了些什么，但至少知道一点，关机之后的讲述，一定有别于她在大众媒介中对该事的描述。这对公开出版物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隐”有着特殊的中国国情。笔者发现，延安电影人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逐步隐匿一些与“正统”不符的个人信息，诸如参加革命的动机（若是不纯的话），家庭成员（若是不洁的话），家庭出身（若是不红的话）等。“满映”电影人也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带着深浅不一的原罪感埋葬过去。一位非常健谈的“满映”老人告诉笔者，在年轻的时候“沉默寡言”，“什么都不说”，减少了很多运动的曲折。

隐言属于“潜文本”中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较为活跃的隐言将以潜台词与主观负偏离的形式出现，企图引发采访人的猜想，它们将是“潜文本”中最早、最易向“显文本”过渡的部分。

4. “虚”——受访人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对人与事进行夸张性描述。

在口述采访中，“虚言”也是极其常见的现象。与“伪”、“误”不一样，“虚言”是立足于历史事件的真实，进行细节性夸张。“虚言”分为几类：夸大工作的难度和意义，以突出自己的功绩；夸大自己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贬低或者看不见别人的功劳；夸大事件的意义，看不见与其余事件的共时关系；将通过耳闻或报刊信息得到的“后见之明”变为自己亲眼目睹的事件或者当时得到的正确性结论。

电影界人士的回忆中，“虚言”现象较为普遍。它是由客观历史原因与主观心理因素共同造成。从外因分析，电影创作是多人协作的过程，在头绪繁多的团体合作中，个人囿于视野关系，只能看到自己小圈子内的工作状态，电影创作流程在某些时期是分离的。比如，纪录片在建国前后长期缺乏编导，摄影师与后期编辑之间，摄影师与摄影师之间，很少交流。建国之初，故事片剧本创作是一个独立于剧组工作的单独流程。还有，某些影片的筹备是由某些会议进行定调，电影事业家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不为普通创作者所知。这些分离影响了参与者对创作事件的整体感知，“只顾谈自己”是对别人工作不知情的无可奈何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虚言”是由内因导致。记忆在摄入阶段，受访人为我独尊的性格造成他观察周遭事物的

“窄视”，使“我”在事件中的“影子”变大，覆盖他人。记忆在存储阶段，受访人不取证于外，于内心深处反复咀嚼发酵，关于“我”的部分变得更加虚幻。记忆在调出阶段，由于预设听众，或多或少带有表演成分，虚夸有增无减。

真实性的价值毋庸置疑，“伪”、“误”、“虚”、“隐”对历史撰写有益处吗？这个疑问建立在一种传统假设基础上。首先，假设存在着一种绝对“真”、“正”、“实”、“显”的历史描述。其次，也存在一个可以判断“伪”、“误”、“虚”、“隐”的法器。按照这种假设，一切的不真实都可以被筛选出局。这样的假设笔者不认可。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体化的绝对真实，等待人们像发现新大陆般发现它。真实与虚假并没有界限。为正史所承认的真实，也许是虚假；口述中的狂言也许是真实。今天的真实也许在明天就是虚假；今天的虚假在明天也许就是真实。

真实本身也分为客观真实与心理真实两个概念。客观真实是不为个人情绪所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心理真实是指个体心理感受到的，或者被主观意愿改变后呈现的事实。心理真实随着时间、地点、听众的改变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对象。“伪”、“误”、“虚”、“隐”是主观真实的呈现。受访人会虚言自己在伟业中的作用，及在一次被拨乱反正的事件中受害的程度，会隐去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等等，已经成为共识。上述种种，都是历史投射在不同个体身上所产生的心理真实，照波特利的说法：“不真实的陈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²⁸⁾这些“不真实”的“真实”对历史撰写并非完全不足取信，它既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丰富。

首先，干扰丰富了事件的复杂性。由对话问答导出的不真实，既不是对已有史实的依附，也不是根本翻盘，而是提供了一种更多元、复杂的背景，让撰史者拥有更多声部的原始材料，扩充其思路。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尽可能的将不同的声音都反映到这个故事中来，口述历史不是简化历史描述，而是使得它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趣”。⁽²⁹⁾波特利也谈到：“口头见证的重要性经常并不基于它对事实的依附，而是会基于它与事实的分歧。”⁽³⁰⁾

其次，那些完全不愿意示众、沉睡的“隐言”对历史也非毫无贡献。表面上，访谈受阻，眼看着一段事实就此深埋于历史的坟场。但，谁说这没有价值呢？至少未来的学者在撰史时，听到采访人的问话，看到屏幕上的沉默，就能够知晓事实已经不可挽回地遗落在历史黑洞之中。比起那些瞎猜妄想的史料来说，这就是一种明鉴。历史本来就是由留存下来的“万一”与丢弃掉的“一万”组成。在对话中沉默，同样是一

(28)(30) History Workshop, 12. P. 100. 转引自[英]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71页。

(29)同(16),第3页。

种“发声”。

又次，“不真实”同时也是财富。历史学家认为，“谎言也是一种沟通的形式”，⁽³¹⁾“伪作的价值也不能一概否定”。⁽³²⁾记忆变异与单纯的客观事实有着同样的价值。把不真实为何产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将有助于史家更深层次地了解历史。不真实反映出各种心态，“空洞的套话，来自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及集体意识形态的真实；不愿面对自我的失误或缺陷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修饰或自我美化，来自个人心理潜意识及自我提升愿望的真实；而个人的情绪记忆偏差，则更是一种心理存在的真实状况”。⁽³³⁾搜集陈墨先生所称的“心理病历档案库”，将丰富一门新的史学——心态史（有别于心理史学）。它从特定时代特定族群的“不真实”现象着手，考察社会语境对个人、族群、国民的影响，描述社会记忆如何被建构，最终完成族群心态史、社会心态史、国别心态史的写作。有人怀疑口述的真实性，但在这点上却没有太多分歧。英国学者约翰·托什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宣称：“口述研究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表述或一种对共同体政治的表现，不如说是作为表明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³⁴⁾

退言之，不论撰史者如何主观排斥不真实，不真实依然会是其著述中不可缺少的一面。撰史好比搭建金字塔，它是由撰史“现在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底座，由“主观真实”（撰史愿望）、“客观真实”这两个阳面与“不真实”这个阴面共同建构的四面体。上溯《史记》，下至中国现当代史，无不在意识形态观照下呈现某种程度的虚美隐恶。司马迁《太史公书》中涉及西汉皇室的十篇文章被武帝“怒而削去”，从此失传。西汉褚少孙，东汉杨终都曾受昭删补，最终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

口述既是“不真实”的供货商，也是检验“不真实”的工具。史家需将口述与其它文献资料互证使用，其重心就是对史料进行“正误、辨伪、发隐”，⁽³⁵⁾排除干扰，抵达事件的核心。就如唐人刘之幾言：“博闻善择、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在比对过程中，如果发现口述与其他史料之间有出入，尊重史料取信的原则（而不是轻易地否定口述）：事件参与者比事件转述者更可靠；两人以上陈述的比孤证更可信；离事件发生时间、地域越近的史料一般越可靠（即傅斯年所说“近人的史料”）；与所叙人或事越没有利益关系的陈述越可靠；经查实后，证明该受访人所述事件的真实性比例越高，其公信力也越高，以此类推，他所言，哪怕是孤证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唐德刚就是根据顾维钧所说的秘闻后来都被证实可靠，推断他所言蒋介石与张学良在“易帜”前后的金钱交易有道理。⁽³⁶⁾

口述与未来的历史撰写

在口述首现时，历史的聚光灯从舞台中心的精

英们扫向了周围的黑暗地带——人民。保罗·汤普逊称其“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³⁷⁾100年以后，历史学家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被聚光灯打亮的部分居然是未来史舞台的中心，还有大量的信息遗失在历史剧场的黑暗地带。口述作为宠臣的角色势必要让位于新的史料。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趋势。

今天，新的原料场已经出现。

博客、播客、社区论坛、微博、飞信群，为撰写人民史所储备的资料从未像最近二十年这样如此数量惊人。就像当年历史学家从口述史料中能够找挖掘出非洲史、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村落史、家庭史、移民史等宝藏，填补精英史的空白那样，未来的史家可以直接将触角伸向更广阔的民众。唐纳德·里奇概括口述历史的精神是民主驱动力——“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³⁸⁾在此，他省略了一个主语，谁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答案是——口述历史工作者。问题就在于此，现在，人民不需要任何人将麦克风交给他，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麦克风。只需要一根因特网线，或者一部手机，就可以把自己变为全世界的信息发布者。

人民不需要任何权威人士给他麦克风或者“金喇叭”，此时，口述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什么？口述历史存在的理由又在何处？

史学家们会指出，新媒体与口述的不同之处：前者说话不负责任，信息真伪不明；前者往往坠入自我欣赏状态，不客观、不冷静；前者信息过于庞杂，价值筛选难度极大；前者身份不明，信息出处难以考证；前者没有专业史家的引导，不够史料标准，充其量只是“航海日志”（博客 Blog 一词来源于 Web log，log 即航海日志）。

纵然人民自己的麦克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未来的人民史写作一定会大量采撷新媒体中民众的声音。我们今天的受访人是不习惯使用电脑的80岁以上老人，再过50年，口述历史的受访人就是今天30岁，生活在新媒体时代的新人类。在史料构成势必发生偏移的规律下，如何让口述对未来的历史撰写葆有作用，是今天的口述史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以此作为结语，留待我们共同思考。

（黎煜，副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

(31) 同(23)，第178页。

(32) (35) 同(21)。

(33) 同(25)。

(34) 同(1)，第272页。

(36) 同(4)，第25页。唐德刚言：“‘九一八’之前，顾常驻沈阳作少帅贵宾，深知内幕，与笔者所谈幕后消息甚详，亦颇足取信，笔者亦尝以他事，向少帅试探，亦每经证实。”

(37) 同(23)，第7页。

(38) 同(29)。